

理解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種思路：史珮 蘿、吉爾平、史翠菊與培藍觀點之比較

A Way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曾怡仁 *Dzeng, Yi-Ren*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學”(IPE)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其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主要的發展形式：即國際經濟政治學、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全球政治經濟學。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探討此三者的演變原因，各形式的主要研究議題、以及分別提出的不同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經由這樣的討論可以更清楚的釐清 IPE 與“政治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或“國際關係學”等相關學科之間的關係。而本文的研究方法則是透過分析 IPE 各形式的代表性著作來達成，包括史珮蘿的〈國際經濟關係的政治學〉、吉爾平的〈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史翠菊的〈國家與市場〉、帕藍的〈全球政治經濟學〉以及其他相關學者的著作等等。

Since 1970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major stages including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PIE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P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new academic discipline. The author also trie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research agenda,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among various stages. To study these questions may help us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PE and other field of studie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typical textbooks and relative articles of the IPE will be reviewed and analyzed in this study. Especially, the arguments and assumptions of Joan Spero’s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1977*, Robert Gilpi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 Susan Strange’s *State and Marke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88*, and Ronen Palan’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2000* will be compared.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國家中心主義、結構性權力、問題解決理論

Keywor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ate-centric approach, structural power, problem-solving theory

壹、前言

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國際關係研究最顯著的發展就是“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簡稱 IPE) 這門新興學科的出現, 國內外各大學的政治系所, 尤其是國際關係學門, 均有開設這方面的課程。然而關於此學科的定義、研究議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目標等等問題到目前為止仍未有共識。甚至隨著全球化的快速進展, 以及越來越多的超國家行爲者、次國家者行爲者與非國家行爲者參與跨國事務, 已有學者建議以“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PE) 取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對這門新學科的統稱用法。¹到底 IPE (或 GPE) 做爲一門新興的學科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 其僅是隨著國際重要事件 (events) 的發生與演變而爲了應景才產生的? 還是因爲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方法本身出了問題, 需要作調整甚至創新? 爲何 IPE 會發展成爲 GPE? 其意涵爲何? 再者, IPE 在學科的定位上與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國際經濟學 (International Economy) 及國際關係學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之間的關係又爲何? 到底 IPE 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還是僅是針對國際經濟關係中的政治性因素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做探討? 如果是指前者, 則所謂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又是怎樣的一種研究方法? 是否有統一的理論模型或操作步驟? 又如何可將其運用於國際或世界範圍? 如果是後者, 那麼是否有必要, 以及如何可以將國際經濟關係和國際政治關係作區別? 最後, IPE 研究面臨和其他國際關係理論一樣的問題, 那就是應該採取實證主義的維持現狀取向的論述立場, 僅僅限於對現實國際秩序進行描寫與說明 (問題解決理論); 還是必須追求規範性及理想性強的變革現狀取向的理論建構, 將現存秩序的變革可能性視爲理論目標 (批判理論)?

當然, 研究上述這些複雜問題是件困難的工作, 而且也不容易找到唯一共識的答案, 不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張, 他們의思想和概念也各有所長。例如, 美國政治學會於一九九三年, 即針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文獻做了檢閱, 書目就達一百七十幾個之多, 並編成“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 這本檢閱論文集。相對地, 本篇文章的企圖

¹ 目前國內外主流學界仍以「國際政治經濟學, IPE」稱之, 爲了說明方便起見, 本文也以此指涉這門新學科。

並沒有這麼大，主要的目的僅是試圖從當代主要 IPE 學者的經典著作中，針對上述問題耙疏出可能的答案。並且從不同學者的立論辯證過程當中，理出 IPE 這門新學科的可能面貌和發展趨向。文章論述的安排上，首先針對學科的源起背景作一回顧式的思考，主要是說明傳統主流的國際經濟學，特別是國際關係學，面對七〇年代以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變遷，是否已逐漸失去其解釋力，更遑論能作準確的預測？接著在爾後的節次理分別以史珮蘿 (Joan Spero) 的〈國際經濟關係的政治學，1977〉(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吉爾平 (Robert Gilpin) 的〈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1987〉(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史翠菊 (Susan Strange) 的〈國家與市場，1988〉(State and Marke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以及由帕藍 (Ronen Palan) 主編的〈全球政治經濟學，2000〉(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為主要討論的文本。當然也會述及這些學者與其他學者的對話意見，來探求這門學科如何發展成“國際經濟政治學”、“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全球政治經濟學”等三種主要的研究形式。從中可以發現，二十多年來 IPE 不僅討論的議題有所擴充，而且研究的分析層次與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同時這三種研究形式到目前為止，所呈現出的是並行，而非先後取代的遞移關係。

貳、秩序變遷與理論反省

社會科學不論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或者國際關係學理論，基本上是先求對真實世界中的現象 (事實) 作「客觀」「正確」的描述；然後試圖對現存與以往的事務發生原因提供適當的說明，也就是明確事件的因果關係，這因果關係不一定是單一的，也可以是多元因果的；最後，如果野心更大一點的社會科學家則會對有關將來可能發生、可能存在的事務進一步作可信任的預測。此外，事實和理論之間會一直不斷的對話，新事實的出現有時候仍然可以用舊有的理論加以詮釋，有時候則可能挑戰舊有理論的解釋效力，而要求理論作適當的修正，甚至創新。當然，事實的演變是否已經從量變進而達到質變的程度，也就是所謂新事實的出現，或者既有理論的解釋效力是否已經失去，則是見仁見智，不同的學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一樣地，IPE 這門學科會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出現及發展，也可從事實和理論之間的辯證關係來理解。

二次大戰以後至七〇年代以前這段冷戰期間的世界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間的對抗，美國和其友邦國家透過簽署雙邊或多邊的共同防禦協定或軍事合作，提供各式各樣的軍事武器、訓練及軍費援助，甚至直接派遣美軍駐紮全球戰略要地，以防堵共黨勢力的擴張。另一方面，美國經由馬歇爾計劃提供西歐國家及日本經濟援助，以從事戰後重建工作和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此外，美國不僅對友邦國家的工商業產品開放其國內市場，而且也在其主導下成立許多的國際經貿組織，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及世界銀行（WB）等等。尤其是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所建構的美元固定匯率機制規範了西方工業國家之間商業與金融關係，這使得彼此之間的經濟衝突得以降至最低。簡言之，從西方已開發工業化國家的利益和立場來看，冷戰時期國際間的主要衝突乃在於東西間的軍事對抗，韓戰、越戰、其他局部戰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設立、德國的分裂以及核子武力軍備競賽的威脅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因此他們關注的問題是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怎樣維持和管理國際秩序。²

從理論的解釋效力上來看，冷戰時期既然主要是兩極對抗格局，權力分配結構清楚，東西間的軍事衝突甚於西方國家彼此間的經貿糾紛，核子武力競賽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美國霸權地位相對穩固，這樣「現實」的時空背景正符合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的假設或主張而使其成為主流論述。該理論正是強調國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主體，軍備物質力量是權力的主要來源，以及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裡安全保障的追求是國家行為的首要目標等等。然而如學者考克斯（Robert W. Cox）所言，現實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問題解決理論”（problem solving theory），其主要是從特定的立場，尤其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已開發工業化國家的國家利益出發，來提出應予優先解決的問題及解決的方法。此外，現實主義亦是一種維持現狀取向的理論，其乃肯定理論得以成立的秩序現實，即國際社會的行為主體是主權國家，而國家（特指大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維護國家利益。³這樣的論述態度在

² 當然從第三世界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的立場來考量的話，其所迫切關注的問題可能不是美蘇間的對抗，而是如何發展經濟擺脫貧困。但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或研究，特別是主流的現實主義觀點，基本上乃是從西方（大）國家的經驗、利益及立場出發而建構的，這也是其被批評為「西方中心觀」的原因。

³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08-210.

面對七〇年代以後國際政經秩序發生明顯變遷時，其說明及解釋能力必然會遭到限制。

七〇年代以後，冷戰的緊張關係由於美蘇兩強表現對安全問題協議（特別是限武談判）的意願與能力，以及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而有所減緩，蘇聯與東歐共黨國家也發現他們的封閉體系對經濟發展的障礙，而尋求與西方國家貿易和科技交流，兩極對抗體系因之開始鬆動。另一方面，西歐與日本經濟已經復甦，歐洲共同體的發展和日本貿易力量的成長開始威脅美國與西歐國家及日本過去所已建立的合諧經濟關係。此外，七〇年代兩次石油危機造成了西方工業化國家長期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問題，而美國爲了應付越戰支出龐大軍費及經年累積的鉅額貿易赤字更是雪上加霜，造成了嚴重的財政窘境，其國際霸權領導地位因而開始受到質疑。同時，布列敦森林體制瓦解，各主要工業化國家採行浮動匯率政策，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序。最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仍然面臨發展的許多障礙，而要求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就是說，七〇年代以後影響國際關係的主要因素對西方已開發國家而言，已從軍事、安全及外交結盟等所謂的「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議題轉爲貿易、金融、環保、跨國投資以及南北經濟衝突等過去被理解爲「低階政治（low politics）」的議題上面。⁴國際政經秩序和結構的這種變遷必然會影響傳統國際關係的研究，至少必須把國際經濟問題納入考量。

然而，面對這樣的發展趨勢，主流國際經濟學的自由主義比較利益(貿易)原則，同樣顯現出左支右絀的窘境。七〇年代以後西歐國家及日本的經濟已從戰後復甦，他們和美國的經貿往來從過去的依賴或合作關係轉爲競爭關係，每個國家多少都以關稅或非關稅障礙來保護本國的國內市場，而以補貼、關稅減免、技術轉移或利率匯率政策等手段來鼓勵本國產品的出口。也就是說，每個國家所遵循的不是消極的依市場而運作的靜態比較利益原則，而是國家積極介入市場去政治性(策略性)的創造動態的比較利益，以增加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策略性貿易原則取代自由的比較利益原則，其結果就是國際間的貿易衝突增加。既然貿易衝突是由於政治因素所造成的，所以就必須尋求政治性的方式才能解決，自動出口設限、自動進口擴張以及其他的進出口配額談判等，就是近來常被歐美國家及日本所採行來管理彼此間貿易衝突的方法。此外，在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

⁴ 事實上那些議題屬於「高階政治」、又那些屬於「低階政治」並沒有邏輯上的必然區分標準，軍事安全或經濟發展到底孰重是隨著不同國家所處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改變的。而這裡指的是以西方工業化國家利益爲中心出發而考量的用法。

經濟往來，呈現的是不對稱相互依存或依賴關係。邊陲國家認為所謂的「比較利益」並非客觀中立，而是明顯往核心國家傾斜並受其控制，因之要求重建公平的國際經濟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簡言之，國際經貿活動愈來愈充滿政治性，國際經濟學的自由主義比較利益原則也就受到質疑，就是在此背景下七〇年代興起了 IPE 這門新學科，而一開始就是從回應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的發展趨勢出發，並且多數是國際經濟學者參與討論。

參、史珮蘿：國際經濟政治學（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研究）

國際經濟學者史珮蘿(Joan Edelman Spero)教授就是從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的角度來討論 IPE 的內涵，在其〈國際經濟關係的政治學，1977〉(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一書中指出，⁵IPE 有兩個主要的研究課題：一是討論政治因素對國際經濟關係的影響；另一個則是研究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經濟關係中的政治安排管理。就前者而言，史氏指出在傳統國際關係的研究上，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其實並不是一項新的研究主題。從十七世紀的重商主義到二十世紀的馬克斯主義者，一直都在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問題，只是到了二十世紀以後國際政治經濟的研究才被忽略了。⁶而造成此種情形的原因乃是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時期發展成爲強調統計、量化及模型推演研究的新古典經濟學，或所謂的經濟科學，其主張經濟體系乃獨立於政治體系，依循自然法則（natural laws）而運作，政府應減少對市場的干預。政治學與經濟學至此逐漸發展成爲兩門獨立的學科，各自專注於不同的運作過程，而忽略兩者重疊與相互關連的部分。⁷同樣的，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也就分成國際政治學與國際經濟學兩門不同的學科。大多數經濟學家忽略國際經濟運作與政策中的政治因素，而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則往往忽略國際關係中的經濟問題。⁸

⁵ 國內一些學者在一九九四年翻譯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仍將此書譯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但此和英文的書名〈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不是很一致，之間的差距可以是有興趣的及值得研究的問題。

⁶ Jo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London: Allen & Unwin, 1977), p.1.

⁷ 同註 6, pp. 1-2.

⁸ 同註 6, p.2.

史教授進一步指出，過去已有一些國際政治學者研究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只不過大都側重研究經濟現實如何影響政治這一個面向。例如，一些學者認為經濟資源的優劣，國民生產毛額的多寡，與國際貿易金融的地位會決定一個國家的戰略與外交力量，英美兩國能分別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成為政治軍事霸權國家，就是立基於他們強大的經濟力量。⁹簡言之，史氏並不否認在國際關係中經濟對於政治的可能影響，但在該書中她更強調的是，過去研究中被忽略的另一個面向，亦即政治因素如何影響經濟表現。基於此，對史珮蘿而言，IPE 的主要研究課題之一應該就是討論政治如何影響國際經濟關係的發展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政治影響國際經濟關係的情形可以包括宏觀與微觀兩個面向：宏觀情形指的是國際經濟體系的結構和運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與運作所決定的，縱觀整個歷史，經濟活動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都受到外交和戰略因素的制約。例如，十七世紀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下的重商主義經濟關係；十九世紀在歐陸勢力均衡及英國海上優勢的政治體系下，建立以英國為核心的自由貿易國際經濟體系；十九世紀末在英國主導權式微的情況下，出現新的勢力均衡的列強帝國主義經濟體系；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兩強軍事對峙下，所產生的彼此分立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以及七〇年代以來美國國力衰退、美蘇和解與西方多元勢力興起的新國際經濟秩序。¹⁰

而微觀情況則是指經濟政策的形成常常須考量國家的政治利益因素。歷史上經濟禁運或制裁一直是政治、外交作戰的有利工具，甚至被看作是軍事行動的有效替代手段。一九七三年阿拉伯國家對美國與荷蘭的石油禁運是為企圖改變這兩國的親以色列外交政策，而一九八〇年美國則試圖利用經濟禁運壓力迫使伊朗釋放人質就是顯明的例子。此外，一國對外經貿政策亦常被用來服務其他的政治目的。例如，一九八八年美國貿易法案即限制外國購買與國防安全有關的美國工業產品，而美國與中國大陸的貿易談判也常和人權問題掛鉤。最後，對外經濟援助也是另一種可以被用於戰略外交目的的工具。例如，美國在戰後為西歐重建而給予一百七十億美元之馬歇爾計劃援助就是希望西歐能免於蘇聯的侵略。¹¹

⁹ 同註 6, p.4.

¹⁰ 同註 6, pp.5-8.

¹¹ 同註 6, pp.8-9.

IPE 的另一個主要研究課題就是牽涉國際經濟關係本身的政治安排管理問題，就這一部分而言，史珮蘿甚至認為國際經濟關係本身其實就構成了國際政治關係。原因在於國際經濟的相互作用同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樣，都是一種過程，通過此一過程，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成功或不成功地控制它們之間的衝突，或以合作和非合作的方式達到共同的目標。此外，無論是國際政治關係還是國際經濟關係，也都是在沒有最高權威的政府情況下處理國與國之間的分歧與合作。最後，正如國際政治一樣，國際經濟體系參與者亦有意或無意地建立許多規則、組織及程序來管理國際經濟關係的衝突和合作，這些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形式會隨著時間、空間或事務性質的不同而有所改變。¹²例如，二次大戰後至七〇年代以前，布萊頓森林體系的規範有效地控制國際經濟關係的衝突，而此一體系的成功運作有賴於三個重要的政治基礎：(1) 權力集中於少數國家，特別是北美和西歐國家，(2) 這些國家有共同的重要利益和信仰，及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3) 美國有能力也有意願承擔起領導責任。然而到了七〇年代以後，美國領導地位相對退，及西方國家間自由主義的共識減弱，新保護主義興起，以及更多的開發中國家要求分享權力。於是，經濟衝突升高至政治層面，而成爲政治權力的競爭。

毫無疑問，史珮蘿教授明確的提醒我們應該注意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的發展趨勢，這點不論在理論或實務方面無疑都是很有貢獻的。然而上述有關 IPE 的觀點有幾項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第一、她的重點僅在於說明甚麼 (what to study) 可以是 IPE 的主要研究對象或議題，而沒有明確告訴我們該如何 (how to study) 研究這門新興的學科領域，這是後來的學者如吉爾平 (三種意識型態研究取向) 和史翠菊 (結構性權力分析架構) 等人，才試圖對 IPE 提出可行的研究途徑或分析方法。由於史珮蘿教授並沒有提出研究方法或分析架構，因而其〈國際經濟關係的政治學〉一書僅有許多描述性的資料或各式各樣觀點雜陳，而沒有系統性或邏輯性較強的理論論述。

第二、史教授的觀點仍然不出美國主流的“西方中心觀”與“國家中心觀”的態度，其論述主要還是以西方已開發國家爲研究觀察核心，並且忽略非國家行為主體在國際社會中的潛在角色。史珮蘿在〈國際經濟關係的政治學〉中主要就是仔細討論主權國家，特別是一些大的國家，如何運用政治權力形構國際政治體系，設立各種運作機制，來規範國際範圍

¹² 同註 6, pp. 9-12.

內經濟的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活動，並從中汲取最大的利益；以及討論了主權國家如何透過經濟制裁、對外經濟援助或者貿易保護政策，以達到政治或軍事戰略目標。史珮蘿同時在書中也提到，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仍將繼續依賴強大的已開發國家為核心來管理，縱使在多邊體系當中，單靠現存的國際經濟機構是不足以管理的，美國的主導與支持對於多邊秩序的達成仍是具關鍵性的影響。而對於未來南北體系問題，史珮蘿也僅提及，第三世界國家將從北方國家所創的貿易、金融與多國籍公司的管理體系中間接獲利，然而將沒有財富重分配的計畫，她本人也沒有試圖提出解決之道。無庸置疑，國際政治體系會決定國際經濟體系的結構和運作，但對於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是不同的。發達國家間構成的對稱關係與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間構成的非對稱關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此外，現代民族國家失去了以往其在國際體系的絕對優勢地位，國家在和平、穩定、發展經濟各方面的職能均顯著衰退，一些超國家行者，例如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與 WTO 等等；與非國家行為者，例如跨國企業、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國內與國際的非政府組織、甚至地方政府或個人，反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三、史教授認為國際經濟關係本身就構成國際政治關係的說法，會讓人混淆兩者間的區別。正如柳劍平教授所強調的，國際經濟關係具有“自然”和“政治”雙重屬性，也因此國際經濟關係是有區別於國際政治關係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然而史教授似乎只重視後者而忽略前者。國際經濟關係的運作首先是在一定的國際生產力基礎上（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態樣），各國基於互通有無，互補優劣的考量而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各領域中，形成一種自然的經濟聯系關係。然而在現實的國際社會中，國際經濟關係不可能是一種純粹的經濟關係，它必然是一種同時具有政治屬性的經濟關係，參與國際經濟關係的主要行為主體—國家，基於自我利益原則或共同利益原則必然會干預國際經濟關係的運作，這時國際經濟關係才會轉化為國際政治關係，或稱“國際經濟政治”。¹³這就如同在一國之內，國家必定會或多或少的干預市場的運作，在現實上不存在所謂的完全自由競爭市場，但我們也不能因而否定市場的存在，或者否定將非經濟因素排除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價值。或者正如新馬克思主義研究所言，上層結構的政治有相對於基礎經濟結構的自主性，

¹³ 柳劍平，「國際經濟關係區別於國際政治關係的絕對性與相對性」，*國際政治*，(2000, 02)，頁 36-38。柳教授將國際政治關係區分為傳統研究的“國際權力政治”與這裡討論的“國際經濟政治”兩大類是很有意義的。

並且有反作用力影響後者的運作，但我們也不能如此就說上層結構等同於基礎下層結構。如果說國際經濟關係本身就是國際政治關係，那豈不沒有國際經濟關係了？如此，傳統的國際經濟學又要研究甚麼？而且這種說法也會忽略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關係之間的辯證互動關係，同時也混淆了國際政治關係中“國際權力政治”與“國際經濟政治”的可能區別。

14

總之，做為一名國際經濟學學者，史珮蘿的研究應該是屬於範圍較狹窄的“國際經濟政治學”，而非我們現在所認知範圍較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正如史珮蘿在〈國際經濟關係的政治學〉書中所自承的，她並不否認經濟因素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只是該書所要討論的是往往被人忽視，有如錢幣銅板兩面中的另一面，亦即國際經濟的政治動力。其他採行同樣研究方式的國際經濟學學者還包括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庫柏（Richard Cooper）和瓦伊納（Jacob Viner）等人。¹⁵此外，一些國際政治學研究者，如克萊思納（Stephen Krasner），稍後加入討論，也是將 IPE 定義為國際經濟關係的政治決定因素。¹⁶

肆、吉爾平：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

相較於史珮蘿僅針對國際經濟關係提出新的研究議題，吉爾平教授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書中，則包括了研究議題和研究方法兩者的討論。他先在第一章從什麼是“政治經濟學”談起，明確指出其主要的研究議題就是探討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現代世界的國家與市場是安排和組織人類活動的最主要形式，同時兩者是共存且相互作用的。沒有國家，經濟活動的結果將完全由價格機制和市場力量來決定，這是純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沒有市場，經濟資源將由國家或類似的權力機構來分配，這是純政治學家的研究領域。然而世界絕不

¹⁴ 同註 13, p. 37.

¹⁵ Charles P. Kindleberger, *Power and Money: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¹⁶ 例如克萊思納定義為“IPE is concerned with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見 Stephen Krasner,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8.

可能以某種「純粹」的形式存在，國家和市場的相對影響確實在隨時隨地變化著，「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就是要探討這種互動關係。吉爾平接著認為，國家和市場的相互作用也會影響國際關係中權力與財富的分配，IPE 就是要在國際範圍內領會這兩種組織和決定人類活動的不同模式是如何互動的，從而決定社會的發展。據此，IPE 包含三項基本且相關的研究議題：第一、是關於市場經濟興起的政治經濟因果關係。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是在什麼條件下出現的？它對民族國家的作用是製造衝突，還是促進協調發展？是否需要一個強權國家來維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合作關係？或者這種合作是否會根據相互間的利益關係自然地發展？

第二、是探討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係。與世界經濟活動中心、主要經濟部門以及經濟成長周期的結構變化密切相關的問題是甚麼？國際政治關係的影響何在？政治因素是如何影響經濟事務結構變化的性質和結果？第三，是國際市場經濟對國內經濟的重要意義。世界市場經濟對個別國家經濟發展、經濟衰退以及經濟福利的影響何在？如何影響國際間財富和權力的分配？世界經濟的功能是使財富和權力集中還是使它們分散？

毫無疑問，上述吉爾平所認定的 IPE 研究議題範圍比史珮蘿的觀點寬很多，不僅包括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的面向，同時也討論了影響國際政治運作的經濟因素，以及涵蓋國際（國際政治或國際經濟）層次與國內層次（國內政治或國內經濟）互動關係的探討。吉爾平的這種研究意圖，相較於史珮蘿、克萊思納或者史坦利蘭德等早先的 IPE 學者是相當明顯的，這可從其書名〈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不將研究標的限於國際經濟關係，也不將研究方法限於政治分析（而是政治經濟分析），可見一斑。也因此，如果說史珮蘿的研究是一種較狹隘的“國際經濟政治學”，那麼吉爾平的研究才是我們現在普遍認知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然而除了將 IPE 的研究議題領域清楚界定外，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對國際政治、國內政治、國際經濟與國內經濟過程四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研究？是否有一套標準化可供依循的操作化研究程序？針對此問題，吉爾平認為有三種不同的基本學派觀點，即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觀點（表一）。¹⁷

從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原型觀點延伸發展的 IPE 理論有許

¹⁷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 25.

多，包括新自由主義互賴理論（Complex Interdependent Theory）、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和新馬克思主義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或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等等。吉爾平進一步指出，此三種學派嚴格說來不應稱為“理論”，而僅是一種“意識型態”，因為；第一、這些思想均建立在對人以及對社會的各種假設基礎之上，而此是無法通過經驗加以證實或否證的，例如經濟自由主義關於理性個體的假設即無法予以肯定或否定；其次，某一種思想的錯誤預言總可以經由引入對某一特定假說的分析而得到辯解，例如列寧發展“錯誤意識”的概念以及“帝國主義理論”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和無產階級革命進展的錯誤預言所作的辯解即是；最後，這三種思想觀點所提出的問題是不同的，而各自所要追求的目的也不相同。例如經濟自由主義強調成長、重商主義重視國家利益、而馬克思主義則追求分配正義。¹⁸

表 1、國際政治經濟學三種意識型態之比較

主義 參數	經濟自由主義	經濟民族主義	馬克思主義
主要行為者與利益歸屬	以個別消費者和廠商為主、利益歸屬於個人	國家是重要行為者、且私人利益和國家利益衝突時，國家利益優先	階級是主要行為者、且利益歸屬於階級
政治與經濟關係	以經濟為主、政治為輔助性工具	政治為主、市場須服從國家利益	經濟為基礎結構、政治則為上層結構
世界經濟交往對國際和平關係的影響	肯定的看法： 國際貿易是互惠互利、且經由交流有助於彼此了解，降低敵意	保留的看法： 國家間經貿競爭可能引發衝突，無法保證和平	負面的看法：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資本主義國家間最後會發生衝突
世界市場經濟對國內經濟發展的影響	核心國家提供市場資金和技術有助於邊陲國家的發展	貿易依存度過高會引發經濟發展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核心國家剝削或制約邊陲國家的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¹⁸ 同註 17, pp. 25, 41-42.

如此，每位 IPE 研究者可依自己的意識形態觀點對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進行分析。針對此問題吉爾平自己早先曾提出一個簡略的看法¹⁹：

「就短期而言，權力的分配情形和政治體系的本質決定了財富分配和生產的架構。不過，就長期而言，經濟活動的定位及有效與否可能改變，甚至粉碎現有的政治體系。而政治體系的轉變連帶也會導致經濟關係的改變，顯示政治還是整個體系當中最具決定性影響力的因素。」

然而吉爾平未清楚說明為什麼政治在短時間內會佔優勢，而經濟則需在較長的時間過後才會發揮它的影響力？而所謂的「短期」與「長期」的劃分依據為何？所謂「短期」過渡到「長期」的背後機制或動力又是什麼？又為何「政治」是最具影響力的決定因素？²⁰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僅反映出吉爾平做為一位現實主義者的研究立場。這種情形也同樣可在自由主義學者的觀點中找到例證，如詹森（Harry G. Johnson）主張「國際經濟決定了國際關係的整體互動以及各國所採取的政策，不論國內政治情勢如何改變、統治者的統治技巧如何、以及外國政府是否橫加干涉，國際經濟都可以改變國際情勢及各國政策。」²¹詹森甚且更期待「就長期而言，經濟力量必定壓過政治力量，也因此人類終將組成世界聯邦政府來解決共同面臨的經濟問題，除此之外再也沒有更為理性的辦法。」²²毫無疑問，這些看法也都僅能視為一種具意識型態的主張，甚至連分析架構都稱不上，這也成為後來 IPE 學者研究的努力重點之一。

例如，新自由主義複合互賴理論學者基歐漢與奈伊（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Jr. Nye）就曾試圖提出四種先後次序清楚的研究步驟（1.經濟過程變化、2.全球權力結構變化、3.特定問題範圍的權力結構發生變化以及 4.國家權力受到國際組織影響而發生變化）來解釋國際關係的變化。²³他們主張應優先考慮技術發展或經濟互賴程度增加所可能帶來

¹⁹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 p. 43.

²⁰ Martin Staniland,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pp. 109-110.

²¹ Harry G. Johns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Questions Facing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the Seventies* (London: British-North American Research Associations, 1970). p. 24. (cited in Staniland,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p. 106) .

²² 同註 21.

²³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Jr.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he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 38.

的國際情勢變化，如果仍無法作充分的解釋，接著再考慮全球權力結構的可能制約作用，然而如欲預測變化則需更精確觀察特定問題領域內的權力結構變化情形，最後兩位學者認為國際組織的作用的解釋力最弱，地位也最不重要。然而基歐漢與奈伊的分析架構也沒有清楚說明步驟優先次序的原因，他們的看法也僅是許多種可能性之一，其有效性必須經由更多的具體個案研究來檢驗。這也可說明為何後來一些互賴理論的學者，包括基歐漢本人，很自然地轉向強調議題領域的國際體制理論（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研究，其目的就是要讓複雜的互賴現象具體概念化，如此也才有助於學術研究的累積。

此外，吉爾平對 IPE 研究提出三種不同意識型態觀點（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以及新馬克思主義）並存的綜合學說主張，可能會讓人誤以為三者彼此間是不能溝通融合的。事實上，在 IPE 的研究發展中，三種觀點常在研究方法上或者實踐的政策建議上，是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的，而非完全對立不可並存。例如，複合互賴理論並不是像古典自由主義原型那樣的泛經濟決定論，忽略國家的角色。該理論認為經濟上的互賴雖然對政府的行動自由構成限制，並且經由民間和政府的管道影響各國的國內政治，不過政府也非毫無做為，如果他們能夠善用其資源及談判技巧，也可以爭取到最大的國家利益。此外，複合互賴理論學者也承認互賴並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平均地分享到貿易的利益，依著互賴的敏感度（sensitivity）和易脆性（vulnerability）程度，每個國家對權力的反應和利益的獲取是不一樣的。²⁴簡言之，複合互賴理論可說是試圖結合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觀點，因而比古典自由主義更強調政治與經濟的互動，以及國內與國際層次交互影響之關係研究。同樣地，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hegemonic stability）論者強調，霸權國必須以獨自承擔公共商品的成本，來換取各國對其支配的國際秩序的認同；而新自由主義的後霸權國際建制理論，雖然認為國家間的利益合作需以各次強權國家為衰落中的霸權國承擔維持國際秩序的成本為基礎，然而一開始霸權國家對於國際體制的建立則是必要條件。由此可見 IPE 的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間並非水火不容，反而在許多地方的思考邏輯是互相補充，而非全然互斥。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依賴發展論（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y）以及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也是試圖進一步結合現

²⁴ 同註 23, p. 116.

實主義的權力觀點和馬克思主義的結構觀點，而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向發展。這主要是現實主義從過去的關聯性權力（relative power）轉為較重視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觀點的研究，而馬克思主義也從工具主義的國家立場開始接受國具有相對於經濟基礎結構的自主性看法。例如，依賴理論認為許多邊陲國家經濟不發展並不是如現代化理論所稱，是由於本身內部因素造成的，其主要的原由乃是由於核心國家所支配的資本主義分工體系，經由不平等的交換關係形成的，而邊陲國家的政權僅是跨國資本的買辦代理人。如果說依賴理論對國內外關係的討論較偏重國際因素，而且認為政治體系的運作是受到經濟基礎的影響，這種立場看似是一種偏泛經濟決定論的觀點。然而，核心國家對邊陲國家的剝削既然不是存在於傳統馬克思主義所認為的生產過程，主要是在於不平等的交換過程，而後者正是由核心國家透過政治權力的展現而創設和維持的，如此依賴理論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的政治化了。此外，依賴理論學者對於邊陲國家如何擺脫低度發展的主張，不論是推行溫和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或者是進行激進的社會主義革命，也都有著拉丁美洲民族主義的排外情感，特別是反對美國經濟帝國主義。後來對其修正的依賴發展理論（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y）由於受到新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相對自主性（state autonomy）」概念研究的影響，認為邊陲地區的國家機器並非僅是跨國公司的工具，而是可能具有相對於統治資產階級的自主性與能力（capacity）來結合跨國資本與本土資本、本土勞工以及技術官僚，形成三角聯盟關係（triple alliance）以求取國家的發展，東亞的新重商主義與發展導向型國家模式（developmental state）就是在此背景下的進一步發展。這樣依賴發展理論的焦點就從國際經濟的結構因素轉向國內的政治因素來做探討。如此，其研究方法必然是反對宏觀的大理論，而主張重視個案研究與歷史分期的「歷史結構分析（historical-structural analysis）」研究方法。

再者，吉爾平針對 IPE 研究所提出的政治經濟分析綜合途徑，嚴格細究仍然不夠全面。事實上，政治經濟學研究可以大略分為兩大類：第一、是以研究議題來定義此學科，即政治經濟學就是探討政治與經濟（或國家與市場）互動關係的學科。至於如何研究的方法則可以包括自由主義、現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三種不同意識型態的並立觀點，並不尋求統一的研究方法。如上所述，吉爾平一九八七年的〈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一書，主要即是採用此種研究方式。然而政治經濟學（或稱新政治經濟學）研究還包括另一種方式，就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自利經濟人概念或研究方法，來研究政治行為或政治制度，前

者即為公共選擇理論，而後者就是所謂的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我們可以發現，國際政治經濟學也常採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國際社會中的國家行為或國際制度，例如霸權穩定理論以歐森（Mancur Olson）的集體行動邏輯中的搭便車（free rider）概念以及尋租理論（rent-seeking），來說明自由國際經濟秩序需要霸權國家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才能創設或維持。而新自由制度主義則是借用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概念，強調國際體制（international regime）可以降低國與國之間互動的成本與不確定性，有助於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合作。吉爾平在〈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第一章開頭，雖也介紹了政治經濟學的新古典研究途徑，但在往後各章裡並未深入討論。這要等到吉爾平二〇〇一年的新書〈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才系統的論述新古典經濟研究在 IPE 中的可能應用及目前的研究成果。²⁵

除了上述所提三種意識形態的綜合學說問題外，吉爾平的 IPE 研究還存在一些其他的弊病。例如，他過分強調以國家為中心（特別是美國）的分析取向，認為國際經濟雖然呈現一體化與脆弱化的雙重特徵，但是民族國家在全球經濟體制中依然是居於主導的地位，雖然不是唯一的行為者。尤其是全球經濟管理仍需要強大的領導和經濟大國間的合作，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也必須立足於強而有力的政治基礎之上，特別是美國應當與盟國一起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²⁶同時，由於其採行“國家中心主義”研究態度，必然會忽視一些其他的全球性問題，如環保、人權、兩性平權、國際移工與貧窮等等議題。吉爾平似乎是將這些問題留給各別國家或市場去解決，此與發展中國家所要追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不同。如此，可以說吉爾平的 IPE 研究仍是屬於一種“問題解決理論”（problem-solving theory），以維持既有的國際政經秩序為主要的考量，其研究方法仍舊未跳脫實證主義的知識論框架。此外，吉爾平將政治經濟學定義為研究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此說法穩含的假設是，政治與經濟是分開且平行的領域，並且與社會領域無關，此一假定令人不能滿意，畢竟國家與市場是人類社會為維持生存所選擇的組織，理解其功能與運作必然需關注社會的需求。

²⁵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 4 and 5.

²⁶ 同註 25, pp. 196-233, 362-363, 377-402.

總之，IPE 所面臨的挑戰應該是克服習慣上對政治與經濟的區分，並提出真正能整合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諸領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並且接受各種不同知識論的 IPE 發展可能性。

伍、史翠菊：結構性權力的分析架構（歐洲學者的回應）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得知，過去主流 IPE 研究的顯著特徵，即是採行“國家中心”與“聯繫性權力”的分析態度，並且是“問題解決取向”的立場。相較於史珮蘿與吉爾平的觀點，我們可以將英國學者史翠菊的立場，視為對美國學者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研究的一種回應，並且對近來的全球政治經濟學（GPE）發展提供了思考的基礎。史翠菊主張，為了減低過去一些 IPE 研究的“國家中心主義”與“問題解決途徑”傾向，以及舒緩學者彼此間因意識形態的堅持而無法對話的困境，IPE 應該先從哲學層次思考「價值」的本質問題，如此才有助於掌握全球體系所發生的問題及提出解決之道。²⁷首先，史翠菊認為 IPE 研究不僅如吉爾平所言，可以採用自由主義、現實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等三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來探討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更重要的是應思考人類社會形成發展過程中，對於四個不同目標價值（安全、財富、自由與公平）的偏好排序與選擇問題。這就要求先釐清「人類社會秩序是怎樣運作的？」、「人類如何解決彼此間的價值衝突？」以及「人類社會未來究竟應該如何發展？」等等哲學性問題後，才能知道不同人類社會願意付出怎樣的代價，以求達到怎樣的目標價值。²⁸史翠菊期待經由重視「價值」的道德哲學性思考，IPE 研究者可以釐清自己與學術社群其他成員所持價值的差異為何？在一定的共識上彼此間可以談論的中心議題為何？如此才有可能跳脫意識形態的無止盡爭議，並有助於 IPE 研究成果的積累。²⁹同時可以將吉爾平的 IPE 研究，從探討國家與市場間互動關係，擴展為國家-市場-社會的三元模式。

²⁷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 p. 18.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p. 171-172.

²⁸ Susan Strange, “Structures, Values and Risk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Barry R.J. Jones, ed.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Francis Printer Publishers, 1983) .pp. 210-211.

²⁹ 同註 28, pp. 209-210.

其次，史翠菊指出，傳統政治學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國家”而不是“權力(power)”或“權威(authority)”，這一點必須加以修正。³⁰受到考克斯(Robert Cox)的社會歷史結構理論以及曼恩(Michael Mann)的權力四來源說法的影響，史翠菊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不同的權力運作形式，即聯繫性權力(relative power)和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而後者比前者來的更為重要。³¹聯繫性權力是一種對過程或結果的控制力量，通俗地說，是指甲靠權力迫使乙去做或許他(她)本來不想做的事，就是甲對乙行使權力。傳統國際政治研究，包括主流的結構現實主義和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所側重的都是聯繫性權力關係的探討，並且是採行一種包括政治能力、經濟能力和軍事能力在內的總體國家權力觀點。相對地，結構性權力是一種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是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機構的權力，各國及其政治機構、經濟企業、科學家和專業人員、社會運動等等都不得不在此結構裡活動。並且結構性權力是一種議題領域(包括安全、生產、金融與知識等四個主要領域)，而非總體性，的權力概念。³²這四個議題領域的結構是並列的，沒有一個處於優先的地位，另一方面彼此又是相互作用，如此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權力來源的這種結構性分布特徵，必然造成與權力分配類似的多元化，其結果必然是國際行為主體的多元化和多樣化。此外，由於在安全、生產、金融與知識結構背後，就是人類社會追求財富、秩序、公正和自由四大基本價值的偏好與選擇在起作用，因而必須思索在不同結構的框架下，誰(who)經由使用什麼權力手段(how)來取得四項價值中的哪些價值(what)的問題。如此，IPE研究不應僅為一種“問題解決理論”，而更應包含“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毫無疑問，史翠菊的結構性權力觀點比吉爾平的三種意識形態綜合學說更細緻，這對IPE的研究，特別是作為一種分析的架構，是有貢獻的。然而史翠菊的觀點還是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她並沒有說明所謂的「道德哲學」思考究竟是指回歸十八世紀蘇格蘭啓蒙思想家一如亞當斯密等人一對於道德與利益關係之研究？或者是指新馬克思主義者一如葛蘭西一所主張的批判實踐哲學，認為問題的提出與回答不應限於經院內所做的學術性探

³⁰ 相關的看法可見 Susan Str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State College,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5) .p. 169.

³¹ 同註 30, p. 171.

³² Susan Strange,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C.N. Murphy and R. Tooze,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 p. 39.

討，必須尊重人民群眾由下而上的表達看法，正如葛蘭西所言「一切人都是哲學家」？³³如此，史翠菊原先想擺脫吉爾平三種意識形態綜合學說裡所存在的各說各話弊病，也就無法竟其功。

此外，史翠菊雖然討論了國家與市場在四個結構中的互動關係，然而她並未提出自己明確的本體論立場。例如，國家作為一個行動者（agent）和結構的關係為何？是如結構現實主義者所言，國家間的互動形塑了國際體系，爾後該體系結構才取得了自身的運作邏輯，並反過來制約國家的行為，這種觀點暗含了還原主義的個體主義方法論；或者是如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所主張的結構主義決定論觀點，認為世界資本主義分工體系是獨立於行動者國家的外在物，其制約了國家的對外行為以及國家體系的運作，國家的活動只是體系結構功能需求的結果。史翠菊對這個問題的立場並沒有交代清楚，以至於無法釐清她對國家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是採取單向的制約決定關係，還是雙向的互動辯證關係？此外，史翠菊也沒有說明這四種結構之間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以及結構如何影響國際關係？這就使得她的理論沒有能對國際體系本身的變化動因進行解釋。

最後，史翠菊所提到的知識權力結構中的「知識」，究竟是指技術生產層面的知識，或者是指新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霸權概念，也是不清楚的，她並沒有深入討論思想或意識形態的可能作用力量。如此我們就很難斷言史翠菊的學術立場，到底是現實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這也難怪古吉尼（Stefano Guzzini）將史翠菊歸為國際關係的新現實主義學者。³⁴這些問題的產生，或許是由於她主張折衷主義（eclectic approach）的務實研究態度所造成的。折衷意味著妥協與包容，但也容易導致立場不明或搖擺的問題。然而這應該無損於史翠菊對於 IPE 研究的貢獻，正如其所言，IPE 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問題的提出與尋求共識比急於建構理論模型更重要，它應該是學者間對話的平台。史翠菊這種對 IPE 學科身分的看法，後來也為 GPE 所繼承。³⁵

³³ 轉引自 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6.

³⁴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8). chap. 11.

³⁵ Ronen Pala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London: Poutledge, 2000) .p. 2.

陸、全球政治經濟學

近十餘年來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已經帶來了新的時代（new times）。經濟全球化不一定對所有的國家及企業均帶來正面的好處，也未必會削弱國家主權，國家僅是調整了其行動的領域和手段。甚且全球化現象不僅存在於經濟領域，其也作用於政治、社會以及文化各個層面，因而光是新古典經濟學並不足以適當解釋全球化現象，必須綜合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提出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才能分析，這就促使全球政治經濟學（GPE）的發展。GPE 不僅是研究議題與範圍的擴大，行為者（包括超國家行為者、非國家行為者與次國家行為者）與分析層次的（包括世界秩序、國家形式及社會關係三個層次）增加，也涉及研究方法不斷的推陳出新，以挑戰主流實證主義的認識論獨霸地位，進一步彌補了史翠菊之 IPE 研究所留下來的問題。這至少表現在如下幾個面向：

第一、研究議題的擴大。除了原有 IPE 對於「權力」與「國家」議題的關注外，GPE 同時也探討了「資本」、「勞工」、「跨國公司」、與「全球化」等議題。這六個議題領域是密切相連的，它們相互決定本身的性質，並且以共同而不獨斷的方式，界定了現代全球政治經濟學的知識領域空間。同時，對這些領域的研究沒有任何一項是專屬於 GPE，這使得 GPE 必然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正如帕藍（Ronen Palan）所言，它是一個「四周有邊境的（frontiered）」，而不是有明確界線（boundary）的學科。³⁶這和史翠菊主張，IPE 研究應像美國西部大草原一樣，開放給所有的移民者開墾，勇於嘗試，充滿著各種可能性和希望，而不應搞（學科）圈地運動的說法類似。³⁷

第二、分析層次的整合。早在一九七〇年金德柏格在〈權力和金錢：國際政治的經濟學與國際經濟的政治學〉（*Power and Money: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一書中就提出，IPE 除了研究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相互關係外，也包括國內政治與國際經濟，以及國內經濟與國際政治相互作用等兩個研究領域。但過去 IPE 的發展由於受到國際關係理論的影響，主要還是研究體系層次或以「國家

³⁶ 同註 35.

³⁷ Susan Strange, ed. "Preface" in *Path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ress, 1984).

中心”為分析問題的基本態度。雖然吉爾平在〈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書中曾提及，IPE 就是研究國內政治、國內經濟、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四個領域間所存在的互動關係，但其並未提出系統性的分析架構。基歐漢與奈伊在〈權力與複合互賴〉一書中，對此四領域的關係雖提出初步的分析步驟（參閱本文第十頁），但非完整的分析架構或理論，可說僅是通往不同層次整合研究的半途，而基歐漢本人後來的研究旨趣也轉向以國家為分析中心的國際體制理論。近來 GPE 就是試圖打破此侷限，重視有關國內社會、國家與國際體系三個層次互動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這些研究至少產生兩個較有影響的學說；一個是所謂的“雙層博弈論”（two-level games or double-edged diplomacy），主要討論處於國際政經結構制約與國內利益團體雙重壓力下，國家領導者或其談判代理人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並從中理解國家決策時所擁有的相對自主能力。另一個是屬於馬克思主義脈絡的“新葛蘭西學派”（Neo-Gramscian School）與“歷史社會學派”（Schoo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其分析了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國家形式（state formation）和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三者間的辯證關係。³⁸如果嚴格細分，前者應僅為一種分析架構，適於分析國際間談判問題，而後者才是社會科學理論，有明確的本體論與認識論立場。

第三、權力運作本質的探討。過去主流的 IPE 研究主要關注的是聯繫性的權力，也稱第一面向權力運作（亦即 A 使 B 去做原來不想做的事情，就是 A 對 B 擁有權力），而近來 GPE 則是同時注重權力運作其他兩個面向的探討，包括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和巴拉茲（Morton S. Baratz）的第二面向，³⁹以及盧克斯（Steven Lukes）的第三面向權力運作。⁴⁰所謂第二面向權力運作係指，行為者透過價值、迷思或決策程序的操縱控制，將實際決策的範圍侷限於對自己安全無害的議題。如此可以抑制或掩蓋社會中想改變現行利益與特權分配方式的要求，或將這些要求封殺於進入決策過程之前。奈伊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以及克萊思納的“後設型權力”（meta-power）概念均屬此類。⁴¹而第三面向

³⁸ 例如新葛蘭西學派的考克斯就認為，歷史結構是歷史的框架，而特定的歷史結構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質力量與制度三種力量組合而成，這三種力量相互作用會影響社會關係、國家結構與世界秩序的變遷，並且社會力量、國家與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見同註 3, pp. 217-239.

³⁹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 Baratz, *Power and Poverty: Theory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44.

⁴⁰ 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74). pp. 21-25.

⁴¹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 (1990), pp.166-168. 克萊思納認為，後設型權力是一種改變遊戲規則的能力，見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14.

權力運作是指，權力關係可能存在於行為者主動影響、塑造或決定其他行為者的慾望與偏好，也可能存在於整體系統偏差的動員、再造與強化中。系統偏差的維持與運作除了受個人有意識、有目的的行為影響外，主要是受社會結構與文化模式的影響，甚至包括特定行為者無意識與不預期的行為。在 GPE 研究中，強調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本體論研究之“建構主義”與“新葛蘭西學派”，以及史翠菊的結構性權力分析架構，對於權力的理解就特別強調非意圖的形式。

第四、新理論范式的發展。GPE 除了繼承原有 IPE 的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三大流派觀點來探討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之互動關係，以及借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或模式來研究國際政治（如霸權穩定理論的「公共財」或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交易成本」概念）外，近來也興起一些新的理論范式，並且有轉向利用社會學及哲學研究成果開展的趨勢，如“社會學制度論”、“後發展主義”、“建構主義”、“歷史社會學”、“新葛蘭西學派”與“女性主義”等等。與之前 IPE 三大學派均是採用實證主義的方法論，並持“問題解決理論”的分析態度不同，這些 GPE 研究大都是持後實證主義以及批判的立場，強調行動者（agent）在結構制約下的能動性；重視思想（ideas）在建構全球政經秩序的重要性；以及反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主張不可預測性的歷史主義態度。

簡言之，從研究議題、分析層次與研究方法來看，可以說 GPE 比 IPE 更強調與其他學科相互重疊之處的整合研究，其獨特的學科定位不是透過某些共同的核心假定而形成的，而是由不同的學科互相嚙合的模糊地帶所建構。也就是說，吉爾平的 IPE 較接近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其所謂的三大意識形態綜合學說（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狹義的政治經濟分析，與傳統國關的三大研究取向（包括多元主義、現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雷同，只是國關是研究國際行為主體之間的各种關係，包括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等等，而 IPE 則特別聚焦在國際關係中國家與市場間的互動關係，因而一些學者將 IPE 歸為國際關係的分支學科。⁴²相較之下，GPE 則是跨學科的整合研究，其與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密切度更甚於國際關係。

⁴² 例如 Guzzini 就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試圖對新現實主義再定義，見 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8). Chap. 11.

柒、結論

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IPE 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主要呈現出三種形式：國際經濟政治學、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及全球政治經濟學。一開始 IPE 是針對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的發展趨勢做出回應，進而產生 IPE 研究的雛型—國際經濟政治學（或稱狹義的 IPE），國際經濟學者史珮蘿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描述或分析國際經濟關係中的政治作用因素，討論民族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不過尚未提出明確的研究理論或分析架構。隨著時間的發展，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內經濟與國內政治四個領域之間的互動關係益形複雜，超出之前僅研究國際經濟關係的範疇，逐出現國際政治經濟學。此時一些學者開始嘗試提出研究的理論或分析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吉爾平的三種意識形態綜合學說，是一種偏國際關係分支研究的政治經濟分析。而對美國學者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英國學者史翠菊作了批判性的回應，近來發展的全球政治經濟學，許多的著作無論是研究的議題或方法就受其影響。史翠菊指出主流的 IPE 研究，特別是美國的學者，大都患了採行“聯繫性權力概念”、“國家中心主義”或“問題解決理論”的分析弊病，因而其重新定義權力的本質，提出多元化的結構性權力概念，並以此為分析架構探討誰從結構中獲益的問題。史翠菊的研究因而也被稱為“結構分析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或“新國際政治經濟學”。

近來由於世界經濟國際化和國際政治全球化的發展，不僅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淡化，而且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的分野也越來越模糊，因而政治經濟的分析無法侷限於民族國家及其政府之間的相互關係，而須與全球性的關係相適應，以“全球領域”（global arena）取代“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的研究，如此產生了全球政治經濟學。在史翠菊研究基礎上，GPE 不僅擴大研究議題與整合不同分析層次，同時也進行權力本質的探討和創新各種研究方法論（包括本體論及認識論）。如此顯現的趨勢是，GPE 在其發展過程中減弱了與國際關係之間的關聯，而是反映了在政治經濟學中更廣泛的議題與當代的辯論。

當然在國際經濟政治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或全球政治經濟學，三種研究形式當中，均有許多的學者投入，並不限於本文主要介紹的史珮蘿、吉爾平、史翠菊與帕蘭等人，本文僅是嘗試從這些學者的經典著作中，耙疏出 IPE 這門新興學科的發展歷程，從中觀察研究議題、方法、分析架構與方法論的變遷。當然，這也僅是許多可能的脈絡之一，而非全

部，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體會。期待更多學者投入研究進行對話，如此方可拼湊出 IPE 更完整的圖像，幫助我們更清楚理解身處的全球化世界。

參考書目

- 柳劍平（2000），〈國際經濟關係區別于國際政治關係的絕對性與相對性〉，
《國際政治》，頁 33-39。
-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S. Baratz（1970），*Power and Poverty: Theory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noy, Martin（1984），*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oper, Richard（1968），*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 Cox, Robert W.，“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O. Keohane, ed.（1986），*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1975），*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7），*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1），*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uzini, Stefano（1998），*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 Johnson, Harry G.（1970），*International Economic Questions Facing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the Seventies*, London: British-North American Research
Associations.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Jr. Nye（1979），*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he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70), *Power and Money: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 Krasner, Stephen (1985),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rasner, Stephen (1996),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kes, Steven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74.
- Nye, Joseph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
- Palan, Ronen (2000),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London: Poutledge.
- Smith, Steve, Ken Booth & Marysia Zalewski eds. (1996),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ero, Joan (1977),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London: Allen& Unwin.
- Strange Susan (1983), "Structures, Values and Risk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Barry R.J. Jones, ed.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Francis Printer Publishers.
- ed. (1984), "Preface" in *Path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ress.
- (1988), *States and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1991),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C.N. Murphy and R. Tooze,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1995),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State College,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 (1996),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